

专 题 文 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廖金龙 整理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坚持进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135 周年 辛亥革命 90 周年，我们要通过这周年纪念，努力学习和继承孙先生和辛亥革命志士们的革命精神，继续努力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并更加发扬光大。

一、探索中国的出路

1866 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客家农民家庭。他从青少年时候起，就用心注视国家民族的命运。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究竟是因为什么？对于鸦片战争以

后列强侵略所造成的中国社会，他在用心进行研究。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长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屈服，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后，在1856年到1860年的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1884年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中，外国侵略军又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其中两次占领中国的首都。1904年到1905年，日本同俄国又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战争。几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不断地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企业、社团几乎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由它们管理的港口、“租界”，并且划分势力范围。只是由于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着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中国才没有被灭亡。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地演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不可能战胜这些强大的敌人。他们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告终。

半封建、半殖民地、灾难深重国力日蹙的中国，往何处去？成为中国人民迫切地要回答的问题。当时处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高涨的仁人志士都在着急地寻找答案。无疑地，走上了时代

潮流前列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他们力图以资本主义社会去取代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封建帝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走国家民族独立的道路。

孙中山是站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前面的第一个英雄人物。

二、抛弃改良幻想

孙中山从小接受过“洪杨”农民革命思想的启蒙。在少年时代，他就是一个对封建迷信的叛逆者。他对人“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从刊]第一册第24页）在青年时代他又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教育，他十二岁出国，在檀香山将近六年，后在香港一年。在檀香山和香港的学习和生活中，他开始直接体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文明。他又曾“目击殖民主义者在夏威夷歧视和荼毒当地土著居民和华侨的暴行，又对欧美资产阶级的殖民制度深感愤恨，并寄同情于夏威夷人民的反抗美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这时，他体察了国家民族独立主权的神圣，而对华侨社会，对华侨的爱国本质又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这些当时属于民主思想和进步社会生活的熏陶，使得孙中山从青少年起就成为怀有大志的一位朴素的民主主义者。

正因为他起初还是一个朴素的民主主义者，因此在投身于革命实践之前，还不可能完全脱离“改良”的幻想。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椎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上李鸿章书》）但他提出这些革新主张，以图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难而被漠视之后，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改良的幻想破灭了，从而使他认识到非暴力不足以推翻帝制，他的朴素的

民主思想产生了飞跃。他“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他鲜明地认识非走革命道路不可了。

三、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远大的抱负，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再度来到檀香山。孙中山利用亲属、同学、朋友和师长等关系，积极耐心地做宣传和联络工作，经过努力，终于得到一部分华侨工人、商人、自由职业者、小农场主等的同情和支持。同年11月24日孙中山串连了20多名进步华侨在昇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开会。会上，孙中山提议成立革命团体，定名为兴中会。所定章程第一条便规定，建立这个团体的宗旨是“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

成立会上通过由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充满了爱国激情，强烈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清朝腐败统治所造成的中国被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号召有志之士“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吸收会员的誓词中，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 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出现和初步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分别派会员到附近各埠发展会员，建立兴中会分会。到1895年，檀香山兴中会会员便发展到130人。与此同时，还积极筹集回国起义的经费和组织华侨兵操队，聘请一丹麦军官对部分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其中有些会员后来回国参加了

广州起义。

1895年2月 孙中山从檀香山来到香港 建立兴中会总部 并修订了《兴中会章程》。

四、伦敦蒙难

1895年兴中会组织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把孙中山看作心腹大患 以 1千两白银的重赏通缉孙中山。许多革命党人被捕被杀。孙中山镇定地把同志遣散完毕后离开广州。清政府当时派出大批暗探跟踪追捕，通报所有驻外使馆，密令他们相机缉拿孙中山。给驻英使馆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捉拿孙中山，死活不论。”

在清政府的高价悬赏通缉下，孙中山不得不离开祖国，辗转流亡日本和美国等地。1896年，孙中山来到英国伦敦。他满怀激情 远涉重洋 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经济 寻求救国真理。10月1日，孙中山到达伦敦后，受到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一家的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在康德黎寓所附近的葛兰旅馆住宿。孙中山几乎每天都要到康德黎家里造访。

10月11日，一个晴朗的星期日上午 孙中山照例从旅馆出来徒步到康德黎家去。途中，有三个中国人故作友好姿态，与孙中山攀认同乡 并且邀请孙中山去他们的寓所“抽支烟 聊聊天”。孙中山一再婉言谢绝，但这三个家伙死死缠住不放，当走到伦敦西一区波德兰街 49号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门口时，孙中山被他们挟持推进使馆内，囚禁在公使馆三楼一间小屋里，窗上装有铁栅栏，门上上了几道锁，日夜都有人看守，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诱捕孙中山后，公使馆根据清政府的密电，用七千英镑的高价租了一条两千吨的轮船，还造了一个大木箱，阴谋几天后把孙中山装在木箱内秘密押解回国处死。当时掌握公使馆大权的英籍参赞哈利德·马凯尼对孙中山威迫利诱，企图从他那里了解到其他革命

党人的行踪。但是，身陷囹圄的孙中山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严词拒绝了使馆的一切要求，使他们的阴谋诡计一一破产。

孙中山被囚禁期间，曾想方设法与外界联系，把自己被绑架的消息通知康德黎，以便让他设法营救。在公使馆工作的英籍仆人柯尔的帮助下，孙中山被囚禁的消息传到康德黎那里。

按照英国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任意捕人的。10月17日深夜，康德黎得知孙中山被囚禁在中国公使馆的消息后，立即奔走营救。他同孙中山另一位曾在香港西医学院任教务长的英国好友孟生博士展开了紧张的营救活动。他们一面到英国外交部和警察当局交涉，一面向报界披露清公使馆绑架孙中山的事实，以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为防止清公使馆提前行动，他们还雇了私人侦探，密切注视使馆的一举一动。10月22日英国《地球报》以《惊人的消息——反叛者在伦敦被绑架》为题，首先披露了这一事实。接着，其他各报纷纷转载，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许多同情中国革命的伦敦市民聚集在驻英公使馆门口高呼“释放孙逸仙”的口号。在舆论和公众压力下，英国外交部不得不出面向清使馆交涉。10月27日上午，清使馆终于被迫释放被非法囚禁了12天的孙中山。

当孙中山从使馆出来时，聚集在伦敦回默街的人群热情向他挥手致意，祝贺他获得自由。许多英国人致信孙中山表示祝贺，有一个名叫穆克伦的英国士兵甚至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后来的惠州起义。伦敦蒙难没有吓倒孙中山，反而激起他更积极地继续斗争。

伦敦蒙难之后，孙中山的名声大振。当时的报纸称孙中山为“汉族中之杰出者”“历史中之重大人物”。

孙中山脱险后，不顾清使馆雇用的侦探日夜监视，继续在伦敦居留了近一年。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院等处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潜心研读，进一步接触了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资产阶级理论著作，并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探索救国

之道。孙中山还察看贫民窟，学习有关工会罢工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并与旅英的俄国爱国者交换对两国革命的看法。孙中山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对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当年被囚禁的地方，今天已成为参观缅怀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纪念地。1933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将这间囚室辟为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陈列着有关孙中山活动的文物。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大使馆重建使馆大楼时，又特地将该纪念室修葺一新。纪念室内的红色绒毯上，放置着孙中山和他的老师康德黎的半身铜像。

五、以日本为据点策划革命活动

孙中山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过程中，日本是他据以立足并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以基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策划”。据统计，从1895年起至1924年止，孙中山曾先后十五次踏上日本国土，累计时间达9年之多，几乎占他全部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孙中山在日本不但团结了旅日的华侨和留学生，而且结识了许多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朝野人士，对推动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开始于1895年。那一年1月，他由檀香山到香港，途经日本横滨时，就在船上对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同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再次从神户来到横滨，并在那里正式建立了横滨兴中会分会，华侨冯镜如为会长。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把武装斗争放在重要位置。1897年8月，孙中山自加拿大乘“皇后”号轮船抵横滨。从这以后到1900年6月，孙中山奔走于东京、长崎、神户、马关等地，积极宣传革命，吸收一批华侨参加兴中会。1900年10月发动的惠州三洲田起义，虽然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而失败了，但是，通过这些斗争培养和锻炼了一部分干部，为以后的斗争

积累了经验。

1901年至1903年期间，孙中山在留日学生中进行广泛的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发展工作。孙中山奔走各地疾呼：“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 非从民族根本改革 无以救亡 而改革之任 人人有责。”这时，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国内反清运动的发展，国内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道路。1902年4月26日 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举行“支那亡国 242 年纪念会”，因清使馆和日本警察的干涉未能开成，从横滨赶来的孙中山即率领他们当日返回横滨开会，号召留日学生不忘这次纪念会宣言中所列汉族反抗满族统治的斗争历史。1903年，东京留学生反对沙俄强占东三省，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后因政府禁止被迫解散。孙中山立即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了军事学校，学生除了由日本军事专家教授军事外，还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培养革命思想。

孙中山的活动，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当时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在给清廷外务部的密报中说：“孙文来自英国，屡在东京开会，登台演说，藉以鼓动学生。而学生赴听讲者，日千余人 甚为可惧。”许多有志救国的学生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 如当时在日本的廖仲恺、何香凝、黎仲实等人就经常同孙中山会见，对孙中山后来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把分散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 统一步调 共同斗争。1905年7月，孙中山在美国、欧洲等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之后重抵日本，积极着手组织新的统一的革命团体。不久，经过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在东京与黄兴会晤，并商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和兴中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7月30日下午 孙中山同来自 17个省的革命志士 70多人在东京赤坂区开会，讨论建立新的革命团体问题。孙中山在会上发

表长篇演说，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成一个大团体，以便同心协力，从事革命工作。孙中山的建议获得一致赞成，并被推为会议主席。孙中山最初提议新的团体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讨论 定为中国同盟会 并决定以“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作为同盟会的宗旨。经过多方筹备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终于在 8 月 20 日召开，出席会员有 100 余人 包括国内 14 个省籍的人士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 大会讨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国内外分设 9 个支部（国内有东、西、南、北、中 5 个支部 国外有南洋、欧洲、檀香山 4 个支部）各省区再成立分会。会上 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同盟会总理 并决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继续出版，宣传革命思想。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盟会把原来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统一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步伐。这一年 11 月 26 日，《民报》在东京正式发行 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了“ 民族 ”“ 民权 ”“ 民生 ”三大主义 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在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利用《民报》这个阵地 自撰或口授大意由别人执笔成稿发表文章，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斗争。1906 年 12 月 2 日 孙中山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概括地表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即：“ 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 故要政治革命 不愿君主一人专利 故要政治革命 不愿少数富人专利 故要社会革命。”通过这场论战 澄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阐述了三民主义革命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同盟会会员的革命觉悟和信心，从组织上巩固和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阵地，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六、奔走于东南亚各地

东南亚是华侨聚居的地区。辛亥革命前，世界各地华侨约有 700 多万 其中 90% 以上分布在东南亚一带。华侨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把自己的身家同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迫切希望祖国强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祖国的兴旺发达而战斗不息 以至牺牲一切。因此 孙中山曾经高度评价说：“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

为了宣传革命 组织革命团体 筹集款项 购买军火 策划武装起义，孙中山曾经长期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奔波，生活在华侨当中。

新加坡是孙中山在东南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曾经是受到保皇党势力严重影响的地方。从 1900 年到 1911 年的 11 年间，孙中山多次来到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他在那里向华侨演讲，宣传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腐败的君主专制的清朝政府，摧毁一切陋俗弊政，建设新的国家。1904 年 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创办《图南日报》在东南亚第一次公开宣扬革命。1905 年春节《图南日报》印发一种有反满词句和革命图案的月份牌，得到孙中山的热情赞扬、写信询问 表示希望合作。1905 年 6 月孙中山途经新加坡，在船上同陈楚楠等亲切交谈，告知他们德、法、比诸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团体，此行到日本将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

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首先就到新加坡发展组织。 1906 年 2 月 16 日，孙中山到新加坡，居住在张永福供养母亲的别墅——晚晴园。同年 4 月，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首次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等 12 人 陈、张为正副会长。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是东南亚最早的革命组织 得到当地华侨的积极支持 到 1908 年 会员就达五百多人。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为更好地联络群众和进行宣传活动，同盟会建立了各种名目的书报

社，主要的有同德书报社、开明演说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和同文书报社等。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建立后，派人到南洋英荷属各地的华侨中开展工作。很短的时间内，马来西亚各地纷纷建立同盟会分会，并仿效新加坡的办法，建立书报社作掩护。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地都有同盟会的组织，到1908年，东南亚各地就建立了同盟会分会或通讯处共100多个，同盟会会员也迅速增加，缅甸2343人，越南1190人，连偏处一隅的柬埔寨到1909年也有同盟会会员230人。为加强联系，统一领导，1908年秋在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东南亚各地同盟会的建立，不但为国内革命活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而且成为在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筹款购械、策划武装起义的重要基地。

孙中山曾多次到越南，在河内、西贡、海防等地向华侨群众宣传革命，开展兴中会、同盟会的组织工作。早在1900年孙中山初次到西贡和1902年到河内时，就曾结识了一部分侨商和法国银行买办，并在华侨黄隆生的积极支持下建立了河内兴中会分会。1905年10月，孙中山自日本再到西贡，在堤岸等地受到当地华侨殷切招待和欢迎，在那里建立了同盟会西贡、堤岸分会。为了就近策划和指挥武装起义，孙中山于1907年3月自日本到河内先后策划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汝潮起义、钦州黄光山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与广东邻近的河内、海防成了孙中山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和补给基地。镇南关之役，孙中山还亲临阵地参战，发炮轰击敌军，为革命军伤员裹伤，并到附近壮族聚居的弄尧村访问，向当地农民宣传革命。

1908年11月，孙中山从新加坡到曼谷，经常在耀华力路连三聘街的一条横街向旅居泰国的华侨发表演说，号召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在泰国的活动，就把这条街称为“演说街”，一直沿用

至今。

1907年至1908年间的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同盟会的元气大损。特别是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使部分同盟会会员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失去信心，情绪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于1910年11月13日在庇能（即檳榔嶼）在马来西亚北部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和国内外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孙中山坚定地认为，“一败何足馁，吾囊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而当前“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无计划、无勇气耳”。他激励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强调只要作“充分之筹备”，革命是会胜利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定积极筹集巨款，集中人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即后来震动中外的黄花岗之役。同时，孙中山还召集檳榔嶼同盟会会员和爱国侨胞开会，动员大家为革命捐款。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际此列强环伺、满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图之，将恐国亡无日。”号召大家“踊跃输将”、“共肩救国之责任”。

七、在美洲华侨之中

美洲是仅次于东南亚的华侨聚居地之一，到辛亥革命前的1907年，已有华侨27万多人。最早的美洲华侨许多是被外国侵略者作为掠卖华工的“猪仔”贩运出去的，在侨居国又受到种种歧视和压迫。他们热切希望有一个独立富强的祖国来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爱国思想特别强烈。早在清朝初年，美洲华侨中就开始存在各种秘密的洪门组织，其中影响最大、成员最多的是致公堂，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讲究兄弟义气和乡里感情，分布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部设在旧金山，分堂遍于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和费城等地。美国华侨十之八、九都参加洪门，因此，致公堂在下层华侨劳动群众、小商小贩中有相当广泛的基础。

孙中山和美洲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先后九次踏上美洲的

土地，在那里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长达十一年之久。美洲华侨在经济上支持 1911 年“三·二九”广州起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以至讨袁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充分表现了华侨的爱国心。

自 1894 年孙中山到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后，在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并不顺利，拥护者甚少。这一方面由于保皇势力在华侨中影响较深，同时因为孙中山没有列籍洪门会党之故。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孙中山认为必须亲自加入洪门会党组织。1904 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接受其舅舅杨文纳的建议，经过洪门前辈钟水养的介绍加入了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即领袖、元帅之意）。与此同时，孙中山改组了洪门报刊，并在改组后的《檀香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等文章，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决分两管，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揭露保皇党标榜“爱国”以欺骗群众的伎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使许多受过骗的华侨纷纷登报与保皇党脱离关系。

美洲华侨致公堂成员众多，各地公堂就有一百多所，但相互联系少，团体涣散，难于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孙中山决定着手改组致公堂。1904 年 4 月 6 日，孙中山乘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5 月，他向设在旧金山的洪门致公堂总堂建议，举行洪门会员总注册，并表示愿意亲往各地对洪门会众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孙中山的建议得到总堂负责人的赞同和支持。孙中山还亲自为致公堂重订新章程，明确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明确提出“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表明了致公堂与国内革命党的关系。改组后的致公堂由秘密结社变为带有革命性的政治团体，更有利于在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为了进一步清除改良派在华侨中的影响，孙中山改组了被保皇党徒篡夺的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推荐革命党人刘成禺从

日本来美担任主笔，使之成为革命派在美国的言论机关。孙中山还亲自在报上撰文同当时的保皇派报纸《新中国报》进行论战。孙中山在致公堂和爱国华侨的协助下，在旧金山刊印邹容的《革命军》11000册，分寄美洲和南洋各地华侨，广为宣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04年，孙中山在遍游美国各地期间，于8月底在圣路易城用英文写成《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当时的思想。9月底、10月初，此文在纽约出版单行本，封面用中文写有《革命潮》三字。当时，东京在《革命评论》和香港的《中国日报》都曾翻译转载。1909年11月后，孙中山从欧洲再次来美国，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的华侨中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号召人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身家性命可保矣！”在孙中山的努力和致公堂的支持下，美洲各地很快就建立了十五个同盟会分会。为加强对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孙中山于1910年3月在旧金山建立美洲同盟会总会，并积极筹备将旧金山《美洲少年》周刊改组为美洲同盟会机关报。同年8月以《少年中国晨报》为名正式出版。

国内加紧准备的武装起义，急需大量军饷，因此，孙中山于1911年初继续奔走于美国各地和加拿大，到处发表演说，筹集款项。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孙中山沿途演说募款，“听者二三千人，虽大雨淋漓，亦极踊跃”，许多工人一次就捐出一两个月的工资，仅加拿大就筹集七万多港元，居全球各地华侨为广州起义捐款的第一位。同年七月，孙中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亲自制订了《致公堂筹饷章程》和《革命军筹饷约章》，强调“今时机已至，风云亦急，失此不图，则瓜分之祸立见”，号召广大侨胞“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孙中山亲自率领筹饷局人员，9月初从旧金山出发，沿铁路线自西向东，到美国北部各地募款。

孙中山从在美国各地的活动中认识到，同盟会如同洪门致公

堂联合，就可消除门户之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对推动革命发挥更大的作用。1911年6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议美洲同盟会同致公堂联合，共同开展筹饷救国活动。经过反复协商，议定由致公堂召开特别大会，免除一切繁杂的手续，以简单的仪式宣布全体同盟会员正式加入洪门。双方于6月18日分别在《少年中国晨报》和《大同日报》发表联合布告，宣布美洲各埠所属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大联合。这一措施，扩大了同盟会的社会基础，大大加速了筹饷的进程。对辛亥革命的组织准备起了积极作用。

八、致力于财政外交活动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大地。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作募款旅行。10月12日，孙中山行抵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从美国报纸上突然看到：“武昌为革命党所占领”。孙中山欣喜万分，但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为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孙中山之所以把外交放到重要位置是有道理的。据孙中山的秘书黎照寰回忆：孙中山看到，“因为我们所建立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新的国家，列强可能乘机来侵犯，而我们这时还来不及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样，外交就显得更加重要”。

面对新的形势，孙中山密切注视各大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并作出自己的估计。如1911年5月孙中山“闻东京内阁变更”，立即致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询问日本“对于支那政策有改变否？”东亚大势如何，日本人心如何趋向，请时时详告，俾得有所取资决策”。孙中山当时认为，各国政府中，法、美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德、俄、日持反对立场，英国态度不够明朗，因此，他决定放弃在美国各地演说筹款计划，经纽约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力图避免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